

「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下的中日戰爭—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五次會議」紀實

張世瑛 國史館協修

一、會議緣起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的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國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隨著二戰勝利70週年的即將到來，此熱潮正方興未艾，研究成果更是迭出新義。然而，在整個二戰史的研究天平中，相較於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向來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對於中國戰場的研究，始終侷限在海峽兩岸及少數歐美、日本學者的研究圈內，也甚少有研究者將中國戰場放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視角的大格局下，審視中國戰場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正是有感於這樣的不足，中國大陸楊天石教授、日本山田辰雄教授及美國的傅高義 (Ezra F. Vogel) 教授於 2005 年號召了全球各地對中日戰爭有興趣的學者，強調在國際視野的高度與格局下，重新思考中日戰爭的歷史意義，由以上三位教授擔任總召集人，於美國召開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一次會議」，會後決定這樣難得的國際學者齊聚一堂的對話，所激盪出的火花，應該持續下去，於是規畫以二年為期，定期召開這項中日戰爭國際會議，第二至第四次會議分別於 2007、2009、2011 年在美國、日本及大陸重慶召開。第五次會議於 2013 年 9 月 14-15 日於重慶召開，會議召集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教授、劍橋大學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教授及筑波大學波多野澄雄教授，原先楊天石等三位教授則擔任名譽

召集人，顯見其中薪火相傳的意味，主辦單位更擴大為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日本日中關係史研究會、日本組織委員會及中國西南大學。

二、新取徑與新視野

會議發表論文共計 62 篇，所探討的議題幾乎觸及到中日戰爭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外交、文化等各個層面，其中探討大後方地區於抗戰八年期間歷史變遷的論文計 28 篇，戰時的中外關係計 13 篇，國府決策高層特別是有關蔣中正的研究計 5 篇，戰時中共發展計 2 篇，傳統的軍事史或戰爭史，仍是抗戰史研究的熱點，計有 6 篇，戰時大後方的文化及藝術發展計 3 篇，抗戰文獻史料調查的回顧性論文計 4 篇，有關淪陷區經濟議題的論文計 1 篇。由以上會議論文的類別觀之，正如閉幕式西南大學潘洵教授的學術總結中所指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新視野與新觀點，大致可區分為以下三個方向：

1. 抗戰大後方研究的再深化

隨著戰爭局勢的迅速演變，1938 年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的先後陷落，沿海港口已完全被日軍封鎖，以重慶為核心的西南大後方，無疑成為支撐中國抗戰的最後堡壘。但長久以來有關大後方的研究，仍集中在重慶國民政府等上層組織的政治、外交與軍事

層面，在這八年期間，至少有數百萬名的難民或移民，來往遷徙於大後方與淪陷區之間，如此大規模的劇烈人口流動，放在人類歷史中來看，亦屬空前，但對於戰時的社會現象與經濟民生，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仍然顯得相當不足。臺灣學界有關大後方研究的限制，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史料的不足，由於 1949 年隨著中央政府遷臺所帶來的史料，多半是黨政決策部門的上層資料，有關省市政府在執行面的運作情況，卻是大量收藏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及縣市層級的地方檔案館內。

從這次研討會中大陸學者對於大後方議題的深耕挖掘，若干論文已經討論到非常細部的議題，即可看出掌握原始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多位大陸學者的論文都充分發揮了這項優勢，特別著重於社會史領域的開拓。在實證研究方面，潘洵的〈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人口傷亡調查統計研究〉，根據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所典藏有關重慶大轟炸的社會史料，探討戰時日軍對重慶所實施的無差別轟炸，關於重慶大轟炸造成的人口傷亡狀況，由於日機大規模轟炸的時間長達三年以上，不同政府部門間在進行調查時的龐雜與混亂，歷來說法莫衷一是，作者通過檔案調查資料的比對考證，證實抗戰時期日軍轟炸重慶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19,208 人、傷亡人數 21,876 人、傷亡總數超過 41,084 人。

許多論文皆觸及到近年來極為熱門的議

題，即戰爭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是大後方內國家機器與既有民間社會中各種組織、階層及民眾團體間的合作與對抗。最值得注意的，如劉萍的〈1942年蔣介石裁冗移民令的緣起與流產〉，討論1942年9月蔣中正的一項秘密指示，要求裁撤中央黨政軍機關各部門中三分之一人員，計畫分批移送西北地區，從事屯墾及開發實業工作，最後在缺乏足可落實的推行計畫下，這次的移民措施也如同之前喧擾不休的西北開發議案一樣，無疾而終。這起事件反映了執行者對於西北開發方略的草率，以及中國在面對抗戰的衝擊下，雖然一直試圖擴大大後方的基地，將國府縱深拉至陝甘、青海甚至新疆，但始終無法克服各省區間難以彌合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差異。

耿密的〈抗戰時期大後方跳廠問題論析——以重慶地區為中心〉，探討現代社會公認屬於個人勞動自由權的工人跳槽問題，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卻不僅是涉及勞資雙方的一般經濟糾紛，而被國民政府視為鞏固戰時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屢次發布命令要求各企業、工廠及礦場禁止惡意挖角工人，戰爭造成沿海工業向內陸轉移，但大後方原有的工人數目遠遠不敷所需，造成技術工人嚴重短缺，國府雖然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統制經濟及禁止工人跳廠措施，但連國府主導的官營工廠，都無法做到不互相挖工，戰時國府領導力與控制力的不足，導致許多為駕馭經濟生產與加強社會控制的措

施，在成效上不免大打折扣。

張倩雯的〈要安定或要動員？戰時難民墾殖計劃的多性質〉，探討重慶國民政府如何處理抗戰八年期間，大量流入大後方的難民問題。早在1939年初國府即已針對難民的安置，提出將戰時難民分別移往大後方各地，特別集中於西北地區的墾殖計畫，但國府的開墾行動始終成效不彰，除了難民考量現實環境的消極抵制外，戰時國府在資源上的匱乏，使得其墾殖計畫，多半流於紙上談兵，或任其自生自滅。此外，國府對於難民的安置，也缺乏一套整體構想，不斷游移於安定難民基本生活與納入戰時動員體制的矛盾之中。

戰時大後方的經濟建設也是這次研討會的焦點，久保亨的〈戰時中國的工業發展〉，宏觀分析國府控制的大後方、日汪控制的淪陷區及滿洲國的經濟發展，認為在重慶政府的統治下，從1938-42年間工礦業持續增長，戰時經濟生產支撐了中國的抗戰力量，為抗戰勝利發揮重要作用。作者也提到日本占領下的東北、華北、華中等地，也同時構築其戰時經濟體制，同一時間淪陷區內的經濟生產也較戰前呈現成長趨勢，不過從1941年起，各個政權統治區域下的工礦業生產均呈現下滑，特別是1943年後，下滑趨勢更加明顯。經過抗戰的洗禮，在勝利前夕，大後方經濟在中國整體經濟的比重，上升至整體的一成左右。

2. 抗戰期間中外關係的新視野

對日抗戰的勝利，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大幅的提升，不但擺脫了百年束縛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也一躍為國際四強之列，這使得戰時的中外關係，向來是中日戰爭史的研究焦點。然而，過去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美、中英、中法或中蘇之間的上層外交關係，在這次研討會中有多篇論文注意到以往所忽略的外交議題，戰爭期間的外交不只是大國之間的交涉，也包括中日雙方如何在中立地區或殖民地間角力。王文隆的〈戰時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情報工作，1941-45〉，在東亞僅有澳門是二戰期間從未直接捲入戰禍的特殊地區，尤其 1941 年底香港落入日本手中後，國府在東南沿海地區僅剩澳門這個窗口可以有所著力，這也使得澳門成為東亞最重要的諜報中心之一，本文指出國民黨一直在澳門保有黨務組織，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澳門的黨務系統不但繼續與其他外國使領接觸及收集情報，甚至與汪政權人員建立秘密連繫的管道，在戰爭接近尾聲之際，中立的澳門更成了日汪人員生命及財產逃匿的最佳選擇。

吳淑鳳的〈論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泰越的工作〉，詳述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如何在泰國及越南進行情報工作，由於東南亞向來是英、法兩國的勢力範圍，美國最後也在英方的壓力下，加強限制軍統人員在東南亞的活動。本文指出即使中、英、美同屬於盟國的一分子，但從東南亞戰場的角度來看，

三國在合作的大前提下，卻存在著既微妙又緊張的競逐關係。

戰時到戰後的國際救援組織，也是中外關係中的新課題，米德 (Rana Mitter) 的〈戰後中國的帝國主義、跨國主義與重建行動：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中國，1944-47〉，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為例，探討從抗戰後期到勝利之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中國境內整體社會救濟事業中所發揮的功能與作用。對日抗戰使得中國產生嚴重的戰爭災難現象與難民救助問題，從淞滬會戰開始，西方宗教團體及少數國際救濟組織如紅十字會即廣泛參與相關救助工作，但受限於能力，其救濟範圍多半局限於沿海城市及大後方少數地區，直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入中國後，不僅扮演了國際救援行動中統籌分配物資的角色，更重新型塑了飽受戰爭摧殘下國民健康與衛生防疫的現代意識。

3. 國民政府決策高層與領導精英的新研究

2006 年《蔣中正日記》開放閱覽後，是繼 1990 年代中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開放後，民國史學界在研究及史料上的另一震撼，其餘波仍蕩漾不已。以日記為文本的歷史書寫風潮，正席捲國際學界。本次研討會也有多篇論文探討蔣中正在戰時的戰略部署與政治決策，所觸及的議題或有不同，但都同樣立足於蔣日記的基礎之上。段瑞聰的〈蔣介石與抗戰初期總動員體制的構建〉，分析戰爭爆發後，國府如何建立戰時

的總動員體制，包括制定「國家總動員法」及成立「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但直到1939年初國民黨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國的戰時體制才得以確立，而原先應作為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從成立、改組到解散的過程，可以看出國府在面對總體戰與持久戰的準備、規畫、缺點及困境。

黃自進的〈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聚焦於九一八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中日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國際社會認同的角力過程，及蔣介石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國聯在九一八後並未採取任何有效作為，但蔣判斷只要藉由國聯的機制，讓日本趨於孤立，使中國與國際主流社會接軌，即已達成階段性目標。七七事變後，蔣繼續秉持堅信國際與維持九國公約的態度，雖然同樣未對中國的求援，有任何具體回應，但並未影響蔣的信念。蔣始終相信，中國的申訴只要能夠加深日本與國際組織的裂痕，中國即已達成目的，尤其是九國公約成員國的退讓，反倒加速國府對美國的談判借款，而日本的南進政策，更逼使美國以禁運石油予以反制，終於導致亞洲戰場與歐洲戰場的合而為一。從最後的結果來看，蔣始終堅持訴諸國際組織的外交戰略，可說是在其意志主導下而獲得成功。

三、涉及其他新議題的論文

過去有關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多半

集中在小說、戲劇及報導文學等議題，此次研討會上的多篇論文，則另闢蹊徑，注意到許多以往被忽略的藝術層面，例如，凌承緯的〈藝術大家、和平衛士、文化使者〉，闡釋1940年代揚名國際畫壇的中國畫家張書旂，勾勒出其在戰時美國藝術界的畫作表現，對於中美文化交流與宣揚中國抗戰精神，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以今日的話來說，就是所謂戰時中國軟實力的具體表現。呂進及虞吉兩位作者則分從大後方的抗戰詩歌及電影「木蘭從軍」在重慶放映時的被焚事件，描繪戰時文化的多元面相。

另外，有關抗戰研究與海外史料的整理調查，也是此次研討會的重點，任竟、唐伯友及宋玉武分別介紹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關中日戰爭的檔案文獻，王志昆則介紹重慶地區正在進行的一項有關整合中國西南地區各典藏部門的「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中心」建設計畫，從這個計畫中，也可看出中國大陸對於抗戰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由於此次研討會的論文多達62篇，以上簡單的介紹，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卻可看出其所牽涉的議題既深且廣，許多論文都奠基於近年來才公布的新史料之上，也與近年來熱門的後現代研究、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等觀點互相對話，並對未來的抗戰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國際交流平台。閉幕式中，大會也宣布兩年後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六次會議，將在臺北舉行。